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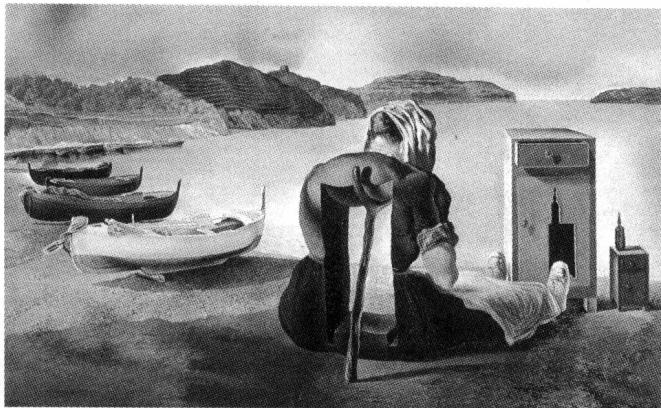
环境美学的兴起，是21世纪美学发展的一条新路，尽管在20世纪后半叶欧美学者已经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环境美学的兴起也同样引发了国际上对“非西方美学”智慧的普遍关注。或者，借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的“桥梁”，我们可以沟通东方与西方，共建一种具有“全球意蕴”的新的美学形态。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主编 杨通进

[美]阿诺德·伯林特/主编 译者/刘悦笛等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环境与艺术： 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环境与艺术： 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主编 杨通进

[美]阿诺德·伯林特/主编 译者/刘悦笛等

Environmental and the Arts by Arnold Eerleant

Copyright © 2002 b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出版社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5)第 14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 / [美]伯林特主编;刘悦笛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4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

ISBN 978-7-5366-8509-3

I.环... II.①伯...②刘... III.环境科学:美学 IV.X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3230 号

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

HUANJING YU YISHU : HUANJING MEIXUE DE DUOWEI SHIJIAO

[美]阿诺德·伯林特 主编

刘悦笛等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 玮

责任编辑:李 茵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黄俊棚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 字数:234 千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册

定价:3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本书主编和重要作者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系美国长岛大学哲学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审美场域——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艺术与介入》、《环境美学》、《住居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等。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

《生态主义导论》[英]

《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英]

《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美]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澳大利亚]

《环境伦理学基础》[美]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美]等

《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中]

《走向生态文明》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 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丛书顾问 [美]Holmes Rolston(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编委会主任 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会副主任 王耀先(原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司)

叶 平(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国聘(南京林业大学)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澳大利亚]Andrew Brennan(La Trobe University)

[美]Dale Jamie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澳大利亚]Ferya Mathews (La Trobe University)

[英]Robin Attfield(Cardiff University)

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

王建明(苏州科技学院)

卢 风(清华大学)

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

苏贤贵(北京大学)

肖 玲(南京大学)

余正荣(广东行政学院)

郇庆治(山东大学)

曾建平(江西师范大学)

韩立新(清华大学)

雷 毅(清华大学)

谢扬举(西北大学)

总序

《走向生态文明》

丛书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个幽灵在地球上四处漫游。这个幽灵就是生态危机。

20世纪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人类在全球范围采取了大规模保护环境的措施，试图赶走这个幽灵。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幽灵不仅没有被赶走，反而像一个吃饱喝足了的吸血鬼，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难以对付。

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翻阅手边的报纸或杂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听到或读到关于这种或那种全球环境问题的报道，例如，温室效应，物种灭绝，森林锐减，能源短缺，大气、土壤和水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等。

困扰全球的这些环境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国。事实上，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过去20多年经济又持续高位增长，因此，我国的环境所承载的压力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得多，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也比大多数国

家严峻。长期的污染和破坏已使我国的生态系统变得非常脆弱。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水位下降了3.7米,面积缩小了312平方公里,面临着变成死湖或沙湖的危险。举世闻名的甘肃敦煌月牙泉在20世纪70年代占地22亩,水最深处达9米,但目前水域仅有8亩,水深不足3米,如不采取措施进行抢救,30年后月牙泉将不复存在。长江目前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这些都是我国生态系统陷入危机的重要信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指标和其他许多社会指标年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环境指标却年年欠账。“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成了我国年度环境报告的惯用语。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全球范围的环境状况却每况愈下。“局部改善,总体恶化”也成了全球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环境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如果说过去50多年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提供了什么教训的话,那么,这就是: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工业文明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产权不清和企业成本的外部性。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不外乎两条:自然资源私有化、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有机的生态系统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然后分给每一个人;环境要素的边界与产权的边界也不可能正好重叠,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努力也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环境污染具有滞后性,政府和企业很难在企业开始营业前就准确地计算出清理该种污染所需的费用。不同企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污染合在一起会产生累积和扩大效应;这种效应导致的环境后果很难评估。对自然物品的定价涉及代际偏好的比较问题。当代人给自然物品的定价难以反映后代人的意愿;这对后代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把

所有的自然物都加以定价,意味着把所有的自然物都当成可以买卖和替换的“资本”。这是对自然的严重曲解。

工业文明的政治理念难以给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支持。工业文明的民族主义理念赋予了每一个国家独立管理国家内部事务的绝对权利。但是,许多环境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在全球范围采取共同行动。环境保护的世界主义诉求会遇到来自民族国家的强烈抵抗。代议制民主也会遇到来自企业和选民的压力。作为组织良好的院外压力集团,企业会对政府的环保立法百般阻挠。选民更关心自身的福利水平,对政府那种旨在关心遥远后代生存环境的动议往往不以为然。被选出来的所谓民意代表在行使权利时可能也会背叛选民的意愿,与各种利益集团同流合污。

现代科技是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延缓资源枯竭的速度。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技进步给环境保护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已经被人口暴增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完全抵消了。不仅如此,经济学中的“杰文斯悖论”还告诉我们,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还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的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的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事实上,环境问题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单纯的技术进步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只有制度层面的综合变革才能有效遏制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也不能完全与环保理念协调。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把自然看成一架没有生命、可任由人类拆解、重组和控制的机器。自然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自然观为现代人掠夺自然的行为提供了辩护。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关注的是个体,它对互利和权利的强调很难为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它把幸福理解为个人感性欲望的满足,这导致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根本走不出越陷越深的生态危机。

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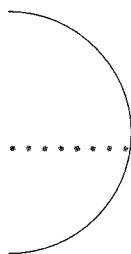
环境主义者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对经济运行方式、政治体制、技术发展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修补和完善,都只能暂时缓解人类的生存压力,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突显自然的整体性及其内在价值的有机自然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既关注人的权利(特别是普遍人权),更强调关怀与责任,倡导和谐与理性消费。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型。如果人类能够未雨绸缪,自觉地实现这种变革,那么,转型的过程就会少一些悲剧和代价。我们希望,《走向生态文明》丛书能够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生态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杨通进

2006 年岁末



译者前言

环境美学的兴起与 大地艺术难题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作为“艺术哲学”(art philosophy)的美学、“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natural aesthetics)、“日常生活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美学的三大主流,这是当代国际美学的“大势所趋”。

2006年6月,国际美学协会(IAA)的诸位理事来到中国举办法理会会议,在同时举办的“美学与多元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遇到了当今国际美学协会的主席、在德国工作的荷兰学者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先生,在与他的交流中,他坚持这种观点:在当下区分出——“艺术哲学”意义上的美学、“自然美学”意义上的美学(即英美术语中的“环境美学”)和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论的美学——这三种“主要美学形态”,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显现出当代全球美学的三个主要发展方向,“环境美学”就是其中的重要生长点之一,无论东方与西方,人们似乎对它的关注尤甚。

作为本书翻译组织者的我,一直就在这些前沿问题上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在“艺术哲学”方面,笔者在2006年出版了46万字、插图百余帧的《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绵延的美学之思》一书,还有《视觉美学史——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一书也基本属于这个范围;在“日常生活美学”方面,曾出版了《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一书,但唯独在“环境美学”方面却只写过几篇小文章,所以,与学界的诸位朋友共同翻译出这本由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主

编的文集《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2002), 算是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吧。同时, 整个翻译活动无疑也是我们共同“虚心学习”外国经验的过程。

一、关于本书的主编

在 2004 年 5 月, 本书的主编、美国长岛大学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曾来到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访问,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环境美学专家之一, 在那次的演讲当中, 他却根本没有提及环境美学, 而是按照他早年研究《审美场域: 审美经验的现象学》(*The Aesthetic Field: A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1970) 的路数来继续重思“美学原论”的问题, 这也是对其《艺术与介入》(*Art and Engagement*, 1991) 相关思想的某种发展, 这些新的观念收录在他那一年末最新出版的文集《重思美学》(*Re-thinking Aesthetics: Rogue Essays On Aesthetics Anat The Arts*, 2004) 当中。然而, 这些只是伯林特工作的一个方面, 他另一方面的建树集中在环境美学领域, 主要著作有《环境美学》(*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1992) 和《住居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Living in Landscape: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1997), 还有 2005 年最新出版的《美学与环境——一种主题的变化》(*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 Variations on a Theme*, 2005)。

在这些独立完成的著作之外, 伯林特还曾主编过两本文集, 一本是与加拿大阿尔伯大学教授、环境美学专家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 合编的《自然环境美学》(*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2005), 另一本则是我们所翻译的这本非常有特色的文集——《环境与艺术》。

在那次演讲当中, 伯林特批判了在康德那里得以定型的“审美非功利”(*aesthetic disinterested*) 之根深蒂固的理念, 这似乎与他所关注的环境美学毫不相干。但事实刚好相反, 环境美学恰恰走到了 18 世纪于欧洲兴起的、以“非功利”为内核的所谓“综合美学”(*Aesthetic Synthesis*) 的反面。可以说, 伯林特对美学的基本理解同对环境美学的

深入研究,其实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联:环境美学的某种理论被“上升”后用以突破传统美学原论的局限,反过来,美学原论的某些拓展也被“下放”到环境美学当中。

当伯林特提出自己的那套独特的“介入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的时候,恰恰吸纳的是环境美学的资源。他特别强调,人们在参与审美的时候,往往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审美感官——“欣赏音乐的耳朵”和“观看绘画的眼睛”,还有我们的味觉系统、触觉系统乃至皮下组织的各种感官都参与其中,这些被视为具有功利品格的感官也承担了审美的重任。这不仅令人想起英国美学家、心理学家浮龙·李(Ver Vernon Lee,1856—1935)所论的“内模仿”说,譬如在观赏一尊瓷瓶的时候呼吸运动、身体姿态等都参与其中,只不过这些微妙的感受很难被知觉到而已。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比较,一个审美者,当他置身于美妙的大自然当中时,他的感受与被置于封闭的美术馆当中当然不同。在自然界当中,“鸟语”“花香”乃至气候所影响的“湿度”、“温度”都参与到审美里面,在自然的审美当中,也许我们才真回归到原始的那种“全方位”的审美。然而,在诸如美术馆这类人造的、被四墙所隔的“审美空间”当中,似乎那种全方位的审美感受就被减弱了许多,眼睛与耳朵的审美功能被强化了(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美术馆观看油画时也可以闻到“油香”,感受到油彩被“堆”到画布上的触感,这与仅仅观看印刷品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由此可见,环境美学的丰富资源,恰恰可以成为美学原论继续拓展的“突破口”。在这方面,中国古典美学亦提供了重要的养料,原始时代的“诗”、“乐”、“舞”的“合乐如一”的积淀、佛教所谓的“根”上的耳、鼻、身、心、意和“尘”上的色、声、香、味、触、法的说法,似乎都指向了一种更为“圆融”的全面审美观。

有趣的是,在那次演讲当中,伯林特的夫人也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原来她在美国也是一位著名的环境设计师,在她为我们所展现的图片当中,我们反倒看到了许多东方的智慧在里面。那种将自然与人工“合璧”的设计倾向,就犹如使人“玄览”到了中国传统的山水那种“可行”、“可望”、“可游”和“可居”(郭熙《林泉高致》)的意境。也许,环

境美学本身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美学”，而且也是一种可以“践行”的美学。伯林特与其夫人的“琴瑟合鸣”，就好似环境美学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组合”！

二、作为“日常生活美学”的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作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兴起的美学新学科，就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美学”。或者说，环境美学应该属于“日常生活美学”的一种。这大概已经成为了环境美学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因为环境就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环绕物，它具有“属人”的基本特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美学前沿走势，似乎可以归并为两个干流，一个就是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另一个则是来自日常生活的美学，而环境美学则隶属于后者。

那么，环境美学究竟是怎样在欧美学界兴起的呢？环境美学迄今为止的命运又如何呢？这就要从占据欧美美学界主流的“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谈起。20 世纪的分析美学将“自然美”(natural beauty)的难题置于了理论盲区之内，由于它只关注于艺术，以艺术为中心，从而使得其他可以被审美的文化内容难以被纳入美学视野。

纵观 20 世纪整个欧美美学主流，基本上都转到以艺术为核心问题的研究上面。以“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为鹄的分析美学，则充当了这种新的历史转向的“急先锋”，只不过语言的机制成为了美学研究的主宰。实际上，超出分析美学所聚焦的艺术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开拓，分析美学恰恰是制约了这种继续延伸的美学力量。尤其是在分析美学被定型化之后，这一美学传统里面的绝大多数学者，大多都致力于“再现”、“表现”、“虚构”、“艺术品本体论”、“艺术定义”、“解释”等等的研究上面，而鲜有新的创意出现。最重要的例证就是，英美国家的美学原论方面的著作，都表现出惊人的结构上的一致性，而且无一例外地将自然美问题排除在外。所以，环境美学家们在谈及这个事实的时候，往往都要援引那几本经典的分析美学文选，诸如当代学者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所编的、被反

复再版的《从哲学看艺术：当代美学文选》(*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Aesthetics*, 1962)^①等等选本，从而来指责在分析美学的眼光里面缺少了“自然”的维度。

在 20 世纪中叶，分析美学以艺术为核心的主流趋势，使得被严重忽视的“自然美”问题被一些有识之士提了出来，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恰恰滋生在这一时期。一位理论的“先行者”，就是当代学者罗纳德·赫伯恩 (Ronald W. Hepburn)，他那篇最初被收入《英国分析哲学》(*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 1966) 的《当代美学与其对自然美的忽视》(*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一文^②，最早鼓起了复兴自然美学研究的大旗。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这种被普遍忽视的情况大为改观，当代的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开始超越以艺术为中心的分析美学的主流传统，其基本取向就是“反分析美学”传统的，尽管在许多方面仍受到传统分析美学的掣肘。

从美学史上说，对“自然美”关注的复兴，恰恰是对从黑格尔美学以来忽视自然乃至压制自然美的倾向的反动。分析美学对这一趋向产生了最重要的“反作用力”的影响，其对艺术的偏好是有目共睹的，其所遗留的自然“空场”的确需要美学多加建构。由于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传统分析美学的“套路”似乎更适合于那种直接面对批评、小说、诗、绘画、音乐的语言解析，从而更加深了其自身重“艺”轻“自然”的倾向。然而，分析美学的推力同样是巨大的。在规范的传统分析美学的内部，人们就曾注意到了这种忽视带来的偏颇，而当“自然美学”的旗号被打出之后，追随者甚众，至今愈演愈烈，这从当下国际美学界的现状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对于自然美的关注也许只是一个起点，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问题逐渐被拓展到了环境，环境美学愈来愈受到重视，从而将自然美的

^① Joseph Margolis (ed.), *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Aesthe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2.

^② Ronald W. Hepbur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 reprinted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 (eds.),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4.

研究纳入到自身的体系当中。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的鉴赏超出了质朴的大自然，从而进入到我们更世俗的环境当中”，因而“环境美学才应运而生”^①。

按照卡尔松的理解，从性质上讲，“环境美学”就是“日常生活的美学”^②。伯林特也基本持类似的主张，他同样在一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环境，就是“拓展到广阔的环境里面，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the natural environment）、城市环境（the urban environment）和文化环境（the cultural environment）”^③。但必须指出，卡尔松与伯林特这两位当代环境美学研究的“双子星座”，他们对于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自然审美”（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与“艺术审美”的划分——却是并不相同的，前者主张艺术审美是趋于“静”的“静观”（contemplation），而自然审美才是“动”的“介入”；然而，后者从他的“介入美学”着眼，却将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统统纳入到“介入”的模式当中。

总而言之，“环境美学”的兴起，是目前所能见到的 21 世纪美学发展的一条新路，尽管在 20 世纪后半叶欧美学者已经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环境美学的兴起也同样引发了国际上对“非西方美学”智慧的普遍关注。或许，借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的“津梁”，我们可以沟通东方与西方，共建一种具有“全球意蕴”的新的美学形态。

三、“天地有大美”：大地艺术与“道家美学”的会通

在全球化的时代，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已成为欧美和中国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当今，欧美的美学试图由此来超越以艺术为探讨中心的“分析美学”主流传统；在中国，美学也在努力发掘本土传统中的

^① 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xvii.

^② Allen Carlson, *The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1, chapter 1.

^③ Arnold Berleant,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2.

审美要素,共建以“自然”为核心的新美学体系,这似乎都暗示出全球美学(global aesthetics)研究重心的某种转向^①。

实际上,在美学理论聚焦于自然之前,作为“环境艺术”(Environmental Art)的延伸,“大地艺术”(Land Art. e. Earth Art or Earthworks)^②早就在“审美之维”积极推动了这种思考。

“大地艺术”,是当代欧美艺术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以地表、岩石、土壤等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始材料。该艺术运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艺术观念发源地是1968年纽约德万博物馆所办的展览和1969年康奈尔大学的Earth Art展。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史密逊(Robert Smithson)、米歇尔·海泽(Michael Heizer)、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克里斯托(Christo)和珍妮·克劳德(Jeanne Claude)夫妇、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和丹尼斯·奥本海姆(Dennis Oppenheim)等等。其中,罗伯特·史密逊还以其观念上的独创性,堪称大地艺术最重要的宣言发布者和美学理论家^③。

大地艺术以“回归于自然”为主旨,它参与了“同大地相联的、同污染危机和消费主义过剩相关的生态论争”,从而形成了一种“反工业和反都市的美学潮流”^④!

但遗憾的是,大地艺术对自然美学的深入推进,却被中西美学探索共同忽视。或许这是因为大地艺术毕竟是从艺术角度来探索自然审美的一种艺术样式,而自然美学恰恰要摆脱艺术所占据的传统霸权

^① Heinz Paetzold, “Aesthe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Volume 8, 2004, p. 134.

^② Land Art、Earth Art 和 Earthworks 这三个术语并没有清晰地界分(通译为“大地艺术”),参见 *Oxford Dictionary of 20th-Century Art*, p. 133. 如果一定要在语言上作出区分,三者也可以分别译为“地景艺术”、“大地艺术”和“大地作品”。

^③ 根据最新的报道,2005年夏季,美国艺术家们将罗伯特·史密逊原作于图纸上的“移动船”的大地艺术实现出来,该艺术将船装扮为“岛屿”,随着船的移动在水里面游动。可见,这是一种直接“动态化”了的大地艺术,与其他表面上趋于“静态性的”大地艺术似乎有所区别。

^④ From Expressionism to Post-Modernism: Styles and Movement in 20th-century Western Art, pp. 231 ~ 232.